

当代欧洲政治思想

IL PENSIERO POLITICO EUROPEO

(1945-1989)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主编

黄华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当代欧洲政治思想

1945—1989年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主编
黄华光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L PENSIERO POLITICO EUROPEO
1945—1989
a cura di Salvo Mastellone
CENTRO EDITORIALE TOSCANO
1994

据托斯卡纳出版中心 1994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96-0874 号

当代欧洲政治思想
1945—1989 年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主编
黄华光 译
责任编辑 乔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732)
新华书店经销 新世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8 印张 200 千字
印数 0001—3000
1996 年 7 月第一版 199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50-787-4/D.149 定价:18.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 阿弗尔杜纳蒂、N. 安托内蒂、R. 巴尔迪、L. 巴齐卡卢博、C. 卡里尼、S. 卡鲁索、D. 科弗朗切斯科、R. 库贝都、P. 德马尔科、M. A. 法尔齐·佩莱格里尼、M. 费拉里、G. 乔尔吉尼、S. 马斯泰罗内、M. 蒙塔纳里、F. 帕巴、E. 比依、A. 皮塔西奥、A. 斯皮尼 编写

前 言

在 1994 年 5 月 14 日于佛罗伦萨大学社会研究系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们一致决定把我们提交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柏林墙倒塌时期的政府形式与政治模式》研讨会的报告改写、汇集成书，定名为《当代欧洲政治思想》（1945—1989 年）。

为此，我们必不可少地对各自的论文进行了集体修改，以便使我们的阐述和批判性思考具有统一的形式。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新的文化经验，但我们希望这一体验是有益的，其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幅关于欧洲 20 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和学说主张发展方向的、虽然是大略的、但却是合乎逻辑的图案。

作 者

目 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从敌对结束到柏林墙

- 第一章：美—苏两极主义与欧洲文化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3)
- 第二章：雷蒙·阿隆：民主与极权主义
(迪诺·科弗朗切斯科) (17)
- 第三章：E. 沃格林：东方与西方
(皮埃特罗·德马尔科) (36)

第二部分 寻找一种欧洲政治模式 (英国与法国)

- 第四章：哈耶克和自由立宪主义
(拉依蒙多·库贝都) (51)
- 第五章：过去的传统：迈克尔·奥克肖特
(乔万尼·乔尔吉尼) (65)
- 第六章：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
(里塔·巴尔迪) (75)
- 第七章：贝林：个人与政府
(马尔可·费拉里) (85)
- 第八章：达伦多夫与社会系统
(塞尔焦·卡卢索) (97)
- 第九章：迪韦尔热和法国的总统制
(卡尔洛·卡里尼) (112)

第三部分 西欧的政治学说方向

- 第十章：后期克罗齐的自由主义
(马尔切洛·蒙塔纳里) (129)
- 第十一章：斯图尔佐与立宪问题
(尼科拉·安托内蒂) (140)
- 第十二章：战后至 80 年代的意大利葛兰西主义
(弗朗卡·帕巴) (151)
- 第十三章：萨特和梅洛-庞蒂的“承担义务”
的存在主义(安德莱阿·斯皮尼) (160)
- 第十四章：对当代社会的批判：马克斯·霍克海姆
(马丽亚·安托涅塔·F·佩莱格里尼) ... (179)
- 第十五章：汉娜·阿伦特：“城邦”的目的
(拉乌拉·巴齐卡卢博) (190)
- 第十六章：阿尔蒂埃罗·斯皮奈利和联邦主义
(埃鲁杰罗·比依) (201)

第四部分 一党制度在东欧的终结

- 第十七章：反抗苏联制度的反对派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215)
- 第十八章：苏联模式与意大利共产党
(亚历山德罗·阿弗尔杜纳斯) (221)
- 第十九章：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 (231)

第一部分

从敌对结束到柏林墙

第一章

美—苏两极主义和欧洲文化

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在此几天之前的8月23日，德国与苏联事先签署了一项协议。战争爆发后，俄国军队于9月17日侵入波兰东部，并威胁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芬兰的领土完整。由于法国和英国作出对德宣战的回答，因此看上去似乎是一党集权的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与多元的软弱议会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解释由于1940年6月10日法西斯意大利对法国和美国宣战而得到证实。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宣战，并入侵俄国领土。这导致了莫斯科与柏林关系的破裂，以及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的靠拢。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一项联合声明中公开谴责了“纳粹主义独裁”，并希望在未来的和平前景中建立一个以自由民主为基础的更美好的世界（见《大西洋宪章》，1941年8月14日）。在这一原则宣言中，当时尚处于中立地位的美国力图使人民的自决权得到尊重，促进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确保各国人民的社会进步，避免诉诸武力。

在德国侵略苏联和希特勒对美国宣战（1941年12月11日）之后，1942年1月1日在华盛顿签署了针对德、意、日三大同盟国的联合国宣言：美国、苏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保证把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作为国际政治生活的指南。因此，反对希特勒政府和墨

索里尼政府的战争也成为反对纳粹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极权主义、反对独裁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思想斗争。

在1942年1月至德国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8日)的这段时期内,资本主义制度和集权主义制度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很少被人们所强调,人们突出谈论的是把世界从纳粹主义政权下解放出来的思想价值。欧洲各国的抵抗运动反对的是实行流放、集中营、就地正法的纳粹—法西斯政权的压迫。欧洲各国共产党遵照大西洋宪章的各点精神,重新恢复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活动。

然而,特别是当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那些为逃避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迫害而被迫走上流亡道路的欧洲知识分子却在美国有力地重申,美国的民主制度与在德国及苏联采用的一党独裁制度截然不同。在194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律与国家总论》中,凯尔森写道:“在最近的时期内,出现了一种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政党专政的新的独裁形式。在俄国,这种新形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产物,其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实际上,这种专政已经变成代表着无产阶级利益、反对其他所有政党(包括无产阶级政党)的那个党的一党专政。‘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最初只是用于在俄国实施这种专政的政党,但后来已用于确指一种政府类型。在意大利,法西斯党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政党,它是通过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而登上独裁地位的。‘法西斯主义’一词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一词一样,被用于确指一种政府类型,即中产阶级政党的独裁。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也属于这种类型。在一党的独裁中,执政党本身就具有专制的特点。它的党员要服从党的首领的绝对统治权。在一党独裁中,言论、新闻自由以及任何其他政治自由完全受到压制。任何人都不能表示与该党所接受的主张相左的看法,否则就会危及到自己的财产、自由和生命。在一党独裁中,选举的唯一目的就是掩盖独裁的现实。即便是经济活动,也是以专断的方式调节的。因此,这几种政党独裁方式也

就被定名为“极权”国家”（见《法律与国家总论》1952年米兰意大利文版第306—308页）。

凯尔森的《法律与国家总论》被某些学者解释为围绕“国家一般学说”而展开的长达20多年之久的那场讨论的结论。在凯尔森看来，法具有自身的自主性，不能与社会和政治的需要相混淆；司法准则与自然法不同，它实际上是以一种法律制度为基础的。凯尔森想要强调的是党治国家与极权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代表制度与独裁制度之间的深刻不同。他对各种宪法的分类和对各种政府形式的分析掩盖着一个严重的、令人苦恼的问题：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结束之后，美国的民主制度能够与苏联的独裁制度和平共存吗？

尽管人们开始重新谈论思想上的差异性，但欧洲在1945—1947年的两年中还是为敌对状态的结束而感到兴奋不已。在当时的报刊或演讲中，人们对抗击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大加赞扬，并声言法西斯主义已被击败，民主获得了胜利。这场战争使欧洲所有国家都卷入其中并造成令人恐惧的大破坏，人们深深渴望进行重建并生活在新的制度当中。这种渴望使和平谈判得以顺利完成，许多责任都被推到昔日的政府身上。目睹了自己政府制度垮台的那些国家的人民，急于通过一部新的宪法重建自己的国家，以便解决政治、社会、经济、道德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卡尔·D. 布拉赫尔在《意识形态的二十世纪》中写道，昔日战争的恐怖印象和未来战争的前景促使人们避免了本世纪前半期所特有的那些重大思想错误和行动错误。对这些错误的大张旗鼓的批驳、对人类尊严的理解、对民主的道德价值的尊重，成了这场战争浩劫带来的积极方面，这些积极方面超越了民族的差异，使各国形成了一种战胜者和战败者都置身其中的根本性的一致（见该书第268页）。然而，当1948年“铁幕”在欧洲降临时，这种幻想与希望便枯萎凋零了。

1948年之后，由于划分为4个占领区的柏林市发生的一系列

事件，由于以波恩为首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以东柏林为首都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先后成立，人们已在谈论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

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成立了北大西洋联盟（北约）这一由美国协调、以苏联为假想敌的互助军事机构，自此，“冷战”便宣告开始。如果说美国当时拥有核武器的话，那么苏联则使它的那些在军事上有能力占领西欧的部队处于战争状态。当时双方之间不无相互的恐惧与威胁，人们不断讨论的是两大集团之间紧张关系的升级和相互的“威慑性平衡”。事实上，共产主义在东欧的挺进和西柏林问题导致了同美国站在一起的欧洲国家与同苏联站在一起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分裂。

什么是直至柏林墙倒塌的大约40年的时期内存在于欧洲的“两极主义”呢？“两极主义”实际就是指华盛顿与莫斯科、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之间的国际关系的历史。

在埃尼奥·迪诺尔佛所著的《1918—1992年国际关系史》（1994年巴里版）这一重要著作中，作者用了400多页的巨大篇幅专门叙述了“两极体制”和“两极冲突”。迪诺尔佛认为，在1948年，“欧洲大陆的两个部分已经被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和政治制度分离开来”，并指出，随着华沙条约的签署（1955年5月），欧洲分裂为两大集团便正式“固定下来”。

政治思想史学家可以把这种两极主义视为美国和苏联这两种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冲突。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力图使自己的政治制度具有理想的价值，它们都从历史的角度把自己与美国革命或俄国革命联系起来。从这两场革命中产生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其中一种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对个人权利的维护，另一种则把它看作是对社会义务的维护。美国和苏联都认为自己是其他国家为克服战争遗留的复杂问题而应模仿的政治模式。

如果暂且不论这两种理想的政治模式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断言，由于美国和苏联都想在文化方面为自己的

政治方向进行辩护，因此就导致了两种思想倾向的生成，其中一种坚持个人自由的理想，另一种则坚持社会正义的理想。

我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欧洲政治思想史》最后一部分中指出，“1948年以后美国主义与苏联主义之间爆发的政治对抗，集中体现在‘公民福利观’与‘社会革命神话’之间”。公民福利观把个人和物质性质的因素置于首位，而社会革命神话则预计展开深刻的社会改造。作为文化宣传的工具，福利观没有革命神话那样有效，但是革命使公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并让公民享有行动自由了吗？在美国主义的支持者看来，东欧是一个极权主义的、专制独裁的集团。在苏联主义的支持者看来，西欧依然是财阀资本的、资产阶级对劳动者进行剥削的世界。

美国主义和苏联主义是两种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不论其背后的政治结构如何，它们二者在外交政策中都按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事，总是出于内心的恐惧或出于明目张胆的野心而把自己的做法强加于人，以为自己是作为正义的代表在反对邪恶。由一种道德严谨主义所唤起的美国主义确信应该把欧洲人从俄国的极权主义危险中拯救出来，而由一种历史主义信念所激励的苏联主义则认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并力求争取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胜利。美国主义指责由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实施的独裁；苏联主义则指责大金融资本所实行的垄断。

继“热战”而来的是“冷战”，人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而且既不允其中立，也不容忍妥协。当冲突日益尖锐时，似乎除了追随美国或苏联的方针之外别无选择。

在西欧，那些维护自由制度的作家往往被判定为美国政治制度的支持者，也就是说存在一种旨在于在意识形态上争取所有拒绝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们的文化争取政策。另一方面，那些相信社会正义价值的政治作家也被巧妙地吸引到抗议示威中来，并且被看作是对社会进行反资本主义革新的理论家。

冷战及其两极主义使所有人都多少卷入其内，而且这种政治

冲突似乎就像是在“右翼”和“左翼”之间进行选择，要想回避这种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这种判断可能是受到我在法国长期居留本身的影响，但马西莫·萨尔瓦多里写道：“我认为，两极主义体现出意大利解放以来的整个历史的特点，人们清楚地知道，从意识形态角度、从社会赞同和国际支持的角度看，天民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构成了意大利政治制度的根本的两极”（见其《欧洲共产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都灵，1978年，第78页）。

美、苏两个大国竭力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地位，为此它们使用了从大众传媒到个人策反、从心理压力到各种讹诈的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手段。它们每一方都重视公众舆论，为对方抹黑并夸耀自己取得的成就。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说成是“最佳政治秩序”。

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是“两种社会”之间的冲突，因此，作何选择不仅关系到这个或那个政党，而且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个论理和社会生活。在反对共产主义的论战中，美国政治制度的支持者们利用的是伦理自由主义的价值，并且指出，政治自由应该与市场自由一同实现。苏联制度的支持者则主张开展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是国际性的，从拉丁美洲到亚洲的全世界劳动者都应反对美国的经济殖民主义。

正如朱塞佩·马马莱拉在《1945年至今的欧洲史》（巴里，1992年）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后半叶统治欧洲政治舞台的美—苏两极主义是由一系列政治事件编织而成的。但是，这种两极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应被低估。1948年之后，美国方面一再谈论的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对抗，而苏联方面谈论的则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在一方看来，消极的因素是共产党对公民实行的官僚主义压迫，在另一方看来，消极因素则是迫使劳动者屈从于私人金融权力。如果说美国当局曾开展大量文化活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倾向在西欧的扩展，那么苏联当局则采取严厉行动，使那些不符合列宁思想的学说主张声名狼藉。美国的思

想宣传活动往往通过外交机构的渠道来展开，苏联的思想宣传活动则侧重于各欧洲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是即便如此，欧洲的政治思想依然保留了一种实质上的独特性。

卡尔·布拉赫尔认为，在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压力下，在两个超级大国迫使世界形成两极化的情形下，知识分子们注意到，他们的政治重要性是极大地减弱了。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欧洲复兴的希望。这种复兴也可以以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但是它应该使能够遵循历史的发展、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的那些理想价值得到确立。的确，人们围绕保守主义者的亲美主义和进步主义者的亲共主义进行了许多论战，但是这两者都依然相信欧洲文化的有效性。

在西欧，“人文主义的文化”一直要求恢复欧洲思想的自主性。这种“人文主义文化”响应反纳粹战争结束后出现的热切的革新期望，努力对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时代以及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留下的文化知识遗产进行重新评价。这种欧洲文化实际上对卢梭的思想和托克维尔的论著、法国的空想主义者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巴贝夫和邦纳罗蒂的平等派的密谋和马志尼青年欧洲党的诞生、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进行了重新的研究。欧洲文化的这种历史主义的方针促进了思想的传播，为文化讨论打通了道路。

如果想要在将来避免独裁的灾难，就必须对极权主义这一被打倒的纳粹主义所奉行的政治学说展开历史的讨论，就必须理清国家管理中严重的功能失灵的原因。在汉娜·阿伦特看来，研究极权主义的起源意味着要认识到对公民生活带来破坏的那些政治恶行，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思想专制主义这些群众性的思潮使政治行为发生了变化，并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对于把自己的法律强加到政治组织头上、并动用秘密警察来使任何反对派处于沉默之中的那种首领的一种谴责。因此，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被确认为是极权主义国家。

在 C. J. 弗里德里希和 Z. K. 布热律斯基看来，对于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制度的论述不能停留在历史方面，因为这种论述尤其是政治性质的，因为极权主义是由单一的群众性政党创造的、由某个独裁者统治的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利用官方意识形态、国家的官僚组织、警察机关、经济制度以及对于传媒工具的垄断来践踏公民的个人权利。极权主义独裁及专制制度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在弗里德里希和布热律斯基看来，这一谴责也应扩大到苏联的苏维埃制度以及东欧的共产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从经济改造出发，已变成了全国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事的那一政治阶层的独裁。

以强烈的政治方式提出这些问题，冒有使自己受到意识形态牵扯的危险。因此，在 60 年代前后，人们开始希望看到“意识形态（不论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的终结”，认为欧洲文化应该从冷战所强加的意识形态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70 年代，当人们谈论缓和的时候，为了打破意识形态的两极主义，人们往往援引不属于敌对方面的那些作者。人们当时利用自由主义思想批评美国的政治，或者是利用葛兰西的思想批评苏联，从而建立起一种欧洲自由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的理论。

有人指出，我们可以像 1936 年起便生活在美国的德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所作的那样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尔库塞本人当时之所以撰写《对压迫社会的批判》一书，是因为“先进的工业社会，即美国社会，把人贬格为单面人”。然而，他当时依然不大清楚西方社会应该向何种政治文明前进。他可以对批判的瘫痪、多元主义的衰落、各政党的容忍、经济事务与工会奢求的混合表示反对，但是马尔库塞所提倡的“美学的范围”看来却并不是为解决西方世界的政治、社会问题而提出的行动口号。

有些政治作家由于以批判的精神看待美国或苏联的政治制度而被指责为立场“暧昧不明”，但是他们是力图弄清战争的深刻原因并解释两极主义的学说上的不同。这类解释实质上可分为两种，